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2.009

新时代西南民族地区新乡土叙事 人物形象研究

田玉玲, 李梦莹

摘要: 新时代以来, 广大西南民族地区在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的政策推动下正在发生持久深刻的山乡巨变, 大批新乡土叙事作品聚焦西南乡村、书写山乡巨变, 塑造了一批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西南新村民。通过梳理“村里人”“外乡人”“返乡人”这三类典型人物形象, 倾听他们带领各民族群众在攻坚克难中致富创业、在城乡互动中推动文化传承交融、在守护生态中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 窥见他们守乡、建乡与返乡的足印。作为西南山乡巨变的参与者、创造者和践行者, 他们身上既有传统乡村人物的身影, 也有专属于新时代、专属于西南的特殊烙印。这无疑是作家们的创作新尝试, 以及美学视角拓展的新成果。

关键词: 新时代; 新乡土叙事; 西南民族地区; 人物形象;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6)02-0087-11

收稿日期: 2025-04-17

基金项目: 2025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新时代多民族小说山乡巨变书写研究”(项目编号: 2025Y1123)。

作者简介: 田玉玲(1974—), 女(壮族), 云南文山人,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E-mail: 13888362334@163.com; 李梦莹(2002—), 女, 河南南阳人,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

一、引言

中国现当代乡土叙事已有百余年传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艺、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和八十年代以来的“新乡土文学”, 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脉络^①。阿Q、“老通宝”、梁生宝、“亭面糊”、陈焕生、孙少安^②等鲜活、立体、饱含泥土气息的典型人物在百年乡土文学画廊中熠熠生辉。西南民族地区丰富的乡土故事是乡土写作的重要篇章, 阿权、沙马木札、磨石拉萨、晓雷^③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 无疑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日渐远去的时代印记和苦难抗争的历史记

忆。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2]。国家持续实施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战略,使我国广大乡村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一大批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原创小说,以强烈的在场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创新的审美表达,为新乡土叙事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2022年,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正式启动,旨在“培育一批有朝气、有潜质、有创新精神的文学新人,召唤那些身在山乡基层、饱含创作激情的新生力量,以山乡人写山乡巨变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3]。这是一项长期的文学行动,第一阶段自2022年开始,初步以5年为期。这个宏大的创作计划无疑成为当代新乡土叙事的重大推动力量。“我所理解的‘新乡土叙事’,是着眼于变化了的当下中国,也就是讲述‘新乡土’的故事”^[4]。西南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山川多姿、民俗多彩,是我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阵地,党领导各民族群众艰苦奋斗,持续推动这片热土发生日新月异的伟大变革。大批各民族作家踏访西南山乡,红日《驻村笔记》、光盘《烟雨漫漓江》、范稳《太阳转身》、潘灵《太平有象》、杨胜应《川北风》、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王华《大娄山》、达真《家园》等^③大批优秀作品登上各种排行榜,屡获各类大奖,共同卷起“山乡巨变”书写的西南风暴。

与传统的乡土文学不同,新时代乡村首先应该不再是以前那种溃败的乡村、空心化的乡村、绝望的乡村,而是更多展示一个有希望的、具有乡土文化自信的乡村。就此而言,文学作品更多应该展现一种精神的成长,展现农村人精神文化的尊严与精神成长气质^[5]。西南民族地区的新乡土叙事作品,以其地域与民俗、神秘与新锐、传统与时尚的独特混融风格,为当代新乡土叙事增添了几许新色彩,作品中塑造的大量新时代西南新山民形象丰富了新乡土叙事的人物画廊。根据人物身份,他们大致可以分为新村守乡人、新村外乡人和新村返乡人三个类别,他们在守护文化传统、探寻创业道路、建设美丽家园之间困惑、奔走、纠结。其间,脱贫工作之细腻,城乡互动之深广、文化交融之迅急,创新创业之火热,共同织就了西南山乡巨变的民族画卷。倾听山民的新故事,追随他们守乡、建乡与返乡的足印,可以触摸到闪耀理想光芒、饱含现实温度的新时代气息。

二、新村守乡人:坚守与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等国家重大战略深入推进实施以来,西南民族地区的广大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以后,以信息革命、产业革命为主体推动力量,进一步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山乡巨变。西南乡村的核心主体是农民、牧民,也是村干部、致富带头人、长老能人、留村的老弱妇孺,也是乡村医生、乡村教师、乡村手艺人和小部分的传统宗教祭司等。他们世代生于乡村、长于乡村,与土地、山林、村寨,与村规民约、与山乡民俗早已融为一体。他们是传统乡村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最基础、最核心、最持续的力量,自然也是新乡土叙事中着墨最多的人物群体。他们身上新旧色彩交织,成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 新村旧人:坚守与裂变

面对时代的巨大社会变更,一部分村里人因观念僵化、因迷茫困惑、因委屈愤懑,或反抗、或鲁莽、

或抵触、或徘徊、或惰怠、或消极,成为新时代的旧人物,姑且称之为“旧村里人”或“新村旧人”。他们常常是乡村振兴路上的“沉重包袱”,拖慢了乡村前行的步伐。《烟雨漫漓江》中,赵国田砍掉了母亲亲手种的香樟树为父亲做棺材,违反了国家环保法被判缓刑。尽管在缓刑期间,他熟读了相关法律法规,在母亲去世后仍然坚持要去砍香楠树为母亲做寿材。他“碰上这种情况只能知法犯法”^{[61]80}的这种莽撞反而成了村民称颂的“孝道”。最终,历经多方劝阻,他逐渐转变思想成了香楠树的看护人。《莫道君行早》中,村民罗大嫂不愿意接受土地流转,几次去政府寻衅滋事,无赖刘山坡上报虚假信息,坚持要把自己划成贫困户。这些人物站在自己的立场行为处事,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守旧、个人主义、精明自利农民的代表。但他们却构成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基层力量。所幸,经过几番冲突调解,他们也加入了乡村振兴的行列。《大娄山》中,月亮山村的巫师迷拉是另一类“过渡型”的新村旧人。迷拉一直是月亮山百姓心中拥有万能“神力”的超人,村民的头疼脑热都能通过他的“咒语”和烟雾有所好转,蛇群出没时他边念唱边打手鼓驱赶蛇群。脱贫攻坚战中,县里要求月亮山村整体搬迁,他坚决反对,成了脱贫第一书记王秀林的最大困扰。王秀林带着他的侄女丙妹到北京辗转多个医院看好了哑病,县委姜国良书记亲自看望动员,月亮山其他村民都搬走后,王秀林留下陪伴迷拉和丙妹,最后被冲进泥石流英勇牺牲,迷拉才真正打开了心结。迷拉的三次动摇代表其内心的三次转向:第一次是对科学的认知与外来干部的接纳;第二次是为了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放下了自己坚守一辈子的民族信仰;第三次是对自然力量的震撼与过度自我的悔恨。迷拉在三次动摇中逐渐变化最终“新生”,彻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这些新村旧人不同于传统的旧村里人,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参与了脱贫攻坚的进程,刻上新时代的烙印。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他们守旧的桎梏逐渐松动,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裂变和新生。西南村落共同体千百年发展的进程中,旧村里人看似阻碍迟滞了乡村的发展,但他们常常也是生产生活传统的最后堡垒和稳定器。站在传统的村落伦理视角下,赵国田是孝道文化的固守者、罗大嫂与刘山坡是传统人地关系的依赖者、迷拉则是民族信仰的守护者。他们的焦虑、抗争和新生,是各民族迈进新时代的过渡进程,也是古老民族迈向新生的历史选择。

(二) 新村新人: 变革与传承

在新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新乡土叙事作品中,有一大批敢闯敢干、有办法、有远见、勇挑乡村振兴重担的新人形象,可称之为“新村里人”或“新村新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二是支持转型的“现代农民”。

乡村振兴离不开深谙乡风民情、心里装着村寨百姓的大批基层党员干部,他们身上少了刻板说教和居高临下,深接地气、充满烟火气。《莫道君行早》中,千年村的麻青蒿看似油嘴滑舌、诡计多端,其实是一个敏感、多疑、嘴上不饶人,但真心为村庄发展着想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为了办好村里的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跑出脚皮”^{[7]365},自送外号“麻五皮”。“麻五皮”原本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在校长的刺激下才去参选了村民委员会主任。隔壁花开村的农民牛老五因为被老板拖欠工钱,跑到镇政府办公楼上大吵大闹要跳楼,副镇长与花开村村支书一筹莫展。麻五皮想借此帮镇书记解决问题立下功劳,争取到千年村村小学教学楼修建的批准。麻五皮深知牛老五并不是真的想要跳楼,但此时讲道理讲人情都行不通,他看准牛老五在楼上站了三个小时又渴又饿的当口,给他送上下了泻药的肉包子,逼得牛老五只好乖乖下楼。随后,麻五皮找到整治老板孙大头的妙计,彻底解决了

牛老五的难题。千年村与城里的九鼎公司准备合作建立农业观光产业园，村民因为土地流转问题闹意见，把项目老板喻子涵的汽车堵在村道上，影响了项目开展。麻五皮借酒背诵喻子涵年轻时发表的诗歌，以诗为“媒”成功打动喻子涵。麻五皮用各种“鬼点子”解决了村中大小难题，每次村民投票都能稳居第一。“在我们基层嘛，也不能太拘泥形式嘛”^{[71]29}的工作作风，经由作家带有喜剧色彩的轻逸化处理，与周立波“字里行间横生的趣味交织着我国农民健美乐观的情绪”^[8]异曲同工。除了年轻人，老一辈的乡村干部也在与时俱进，与村民携手共赴乡村振兴之路。《竹笋出林》中的勒吉支书“做啥他都走在前边，遇啥风险他都扛住”。三十年前他入了党，进村民委员会。“胆气足，不会累，不怕苦，干事情火着枪响”。后来当了总支书记，将“送走苏沙尼次（穷鬼）”的誓言化作毕生追求，担子一挑就是三十来年。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候，县里要求背篋村整体搬迁，村民都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活村寨，勒吉支书一遍遍给大家讲文件，一家家做工作，跟大家讲彝族祖先千里迁徙乌蒙山的史诗，给大家说走下山才能过好日子的种种道理和故事。“勒吉背驼，在院坝里一站，身上就像背着一口铁锅”。他身上担的是背篋村的家家户户，也是“藏彝走廊”的千年历史。

（三）新村新农人：保护与开发

除了“新”乡村干部之外，穿梭于田垄之间的“新”农人亦是接“地气”新时代先锋。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跟祖辈一样对每一寸土地都倾注了真挚的情感，构筑起一套质朴却深刻的生态认知体系，他们的“新”体现在将对土地的热爱转化为切实的生态保护行动，用创新思维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乡村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西南广大民族地区是祖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保护绿水青山才能守住金山银山。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角度来讲，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具有乡村振兴效应，生态环境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而且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长久之策^[9]。《烟雨漫漓江》中，明灯是漓江上游地区留守人员巡山队队长，长年不辞辛苦保护山中野生动植物，制服偷猎盗采者。巡山队虽没有报酬，但责任感与专业人员不相上下。明灯是森林公安局的得力帮手，甚至比公安人员更加了解山中地貌和采猎者的作案手段。从桂林城中回来的晓巷劝他走出乡村，他干脆地回答说：“我不出去，我一出去可能就不想回了”“我生来就是山里人，死也该做山里鬼。”^{[6]78}明灯留守家乡的纯粹之心带有理想梦幻色彩，与《边城》中翠翠相似。政府利用村里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在生态保护中发展旅游业，为大家探索致富之路。明灯坚决支持政府保护香楠树的整村搬迁决策，带头搬进了现代化的新社区。但是，他仍然肩负着守林的职责，加入了新时代守林员的队伍，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家园”，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形成了有效呼应。明灯将生态与“三农”结合，属于与自然之间平等、对话、共存的“主体间性”的新型生态人^[10]，是新时代新农人的代表。像明灯这样的新农人，在寻找致富路径时，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态度，不为短视的逐利之风所裹挟，彰显了新时代农民群体发展眼光的成熟与提升。

三、新村外乡人：碰撞与融合

随着山村的日益开放，一大批外乡人走进了西南各地的民族山村，为山乡巨变带来了新动力、新思想、新资源和新风貌。他们包括政府外派的挂职干部、乡村志愿者、科技指导员，也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加入这个队伍。他们的故事与视角为新乡土叙事提供了新的他者镜像。与土生土长的村里人不同，新

时代的新村外乡人带着不同的使命、目标与思想走进西南山乡,为西南山乡的巨变掀起波澜。

(一) 驻村党政干部

干部驻村是我国政府加强乡村治理、推进乡村发展的有力措施。不同历史时期,驻村干部的责任和使命有所差异,但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推进乡村建设发展的目标始终如一。驻村干部自然也就成了新乡土故事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独特的外来者视角,既记录下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经验积累,也映照出其中潜藏的深层症候。

外来驻村干部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满怀理想的热情建设者。红日《驻村笔记》中的主角毛志平“我”原本是市文联主席,年富力强、阅历丰富、敢说敢干。带队到红山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二天,就遇到了群众突然来访,场面难以控制的问题。随即而来的是蒋主任判断失误,强制性拆除天桥导致老人走夜路坠落悬崖的重大事故,一桩桩事件像是寒夜密雨从四面八方袭来,应接不暇。但“人都是有目标的……有一些在逐渐靠拢或者会合,最后形成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也是有目标的”^{[11]210}。“我”带领脱贫小队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见招拆招,不断碰壁也不断探索,甚至在修路资金缺额时,“我”用自己十万元的创作经费垫补。作家笔下的脱贫小队富于新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执着的奉献体现了当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彰显了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党员干部的精神向度和生命哲思。与此同时,新时代的乡村“外来人”中也存在着一部分失意的逃离者。《野猪坪轶事》中的大学生村官,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就来到没有经历“三改”的乡村,长久封闭的空间让他无法融入,在被狗咬伤后匆匆逃走。《豹子》中的脱贫队员李小东认为自己得罪了县长才被下放到豹子村担任脱贫书记,他计划枪杀一只豹子,好用豹子胆治好县长儿子的病早点调回县城。不料意外杀害了穿豹纹上山采菌的村中妇女桃花,铸成大错。这两篇作品从被动下村干部的视角反思脱贫攻坚中的乡村之痛,带有启蒙色彩,也继承了赵树理问题小说的余脉。

饱满情感关怀的女性干部是乡村振兴的另一种温暖的力量,她们以独特的行动和视角呈现出显性魄力与隐性关怀的双向建构。《大娄山》中,龙莉莉接任因为车祸意外去世的娄娄书记,她穿上娄娄的苗服来抚平娄娄母亲的悲伤情绪。《莫道君行早》中,千年村第一书记肖百合通过细腻观察发现村支书麻青蒿与前妻丁香仍彼此相爱,就巧妙牵线促成二人复婚。同时,又以女性视角敏锐发现丁香的工作魄力与生活能力,帮助其开起农家乐实现经济独立。这些女性干部形象打破了传统性别叙事的弱者视角,补充了基层治理的“她视角”,同时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村民情感问题仍需关注的现实。

(二) 扎根乡村的外乡人

西南民族文化的神秘沃土不断吸引“外来人”探访、驻足甚至扎根。达真“康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家园》中,上海男子王本昌毕业后来到川藏高原支援边疆建设。他坐在运粮车上,与司机一起穿行在四千米海拔的重重山峦之间。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逐渐消解了王本昌长期积压的郁闷,他站在车顶纵声呼喊,宣泄着对活着的渴望。司机出于担心将其呵斥下来,这粗犷却直率的关切,让他初次感受到康巴汉子特有的率真性情。此后,王本昌与赤勒多吉一起在桑戈维护“忠”字石。一年多时光中,赤勒多吉对他照顾有加,用酥油和羊羔皮治疗他手背的冻伤,王本昌在赤勒多吉每天清晨的诵经声中,慢慢对藏文化有了真切的感受与理解,“高原的极高、极寒、极苦、极贫、极豁达已经融入了王本昌的身体,都市的做作和繁华渐渐褪去”^{[12]146}。他开始理解高原人们的坦率与真诚,藏文化的深沉与厚朴。此后,王本

昌在川西高原邂逅了他的妻子达瓦志玛,在朝夕相处中,妻子不被困难打败的气概让他真正领悟了藏族人的豁达与坚韧,也使他与康巴藏地文化真正达成和解并相互融合。身份各异的“外来人”对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心灵感受,拨开民族宗教、信仰、习俗的重重迷雾,可以看到多民族之间文化生活的自洽与交融。城里“外来人”的到来,破除了城乡文明冲突的二元对立结构,地方性逐渐融入民族性之中,最后以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新时代乡村形式呈现出来。

(三) 乡建参与者

旅居商人和外来专家是西南民族村寨重要的乡建参与者。一些外来投资者进入乡村投资创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新兴力量。《烟雨漫漓江》中,城里来的唐老板建造富有广西民族特色的乡村民居吸引游客入住,以乡村旅游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助力村民搬出偏远的山寨。《大娄山》中的陈耀博士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贵州山地养羊的天然条件,并决定投资创业。当然,这些外来人中也会混杂一些不良商人,他们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假借合作之名榨取山村的宝贵资源,酿成“发展幻象”与“环境创伤”的双重悲剧。潘灵《太平有象》中的奸商段晓果发现村中有野象后,劝服村民捕象卖象,实则企图把大象私运到泰国表演杂技赚大钱。他们的形象映照出当前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产生活的发展锚点与物欲伪装下的环境背叛。

(四) 青年志愿者

为了积极推进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西南很多村寨都有青年志愿者的身影。《大娄山》中,远在俄罗斯留学的周皓宇网购苗族服饰时,无意中被碧柔村娄娄书记开的网店所吸引。与其他网店不同,这个网店既没有大量精美的宣传图片,也没有模特的现场展示,只是在每一件服饰展台上都配上了娄娄自己创作的一首朴素的小诗,如同“在充满铜臭的商海之中,突然出现这么一抹清新和优雅”^[139]。通过多次的网购交流,他深深感受到贵州苗族姑娘的坚韧和温柔。周皓宇毕业后来到了碧柔村,才得知娄娄遭遇车祸意外去世。此后,周皓宇下定决心留在苗寨,成为一名青年志愿者。他重新启动苗绣工厂,扩大生产规模,并借助网络直播等方式拓展销路,继续带领乡亲们创业致富。青年志愿者是乡村振兴的青春力量,是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的新兴外来建设者,也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这一群体的涌现,也为乡土叙事提供了新的书写视角。周立波《山乡巨变》中因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下乡工作的邓秀梅,铁凝《村路带我回家》中因在农村找到归属感与情感寄托而选择留乡的知青乔叶叶,刘醒龙《凤凰琴》中从被动下乡支教、满腹迷茫到主动担当,坚守教育岗位的张英才——这些“外来人”形象共同构成了现当代乡土叙事中鲜明的文学景观。西南传统的乡土社会与中原的乡土社会在形态、格局上大致相似,但由于山地环境的阻隔,西南乡土社会往往更注重内部结构关系,与外界的交流相对有限,这些拥有各类身份的“外来人”在进入乡土空间时,其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往往与本土文化之间产生更为明显的摩擦与张力。以外来人的视角书写新乡土,能够呈现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使乡土社会的独特性直观展现。当前,乡村日益成为都市人的休闲新空间,也逐渐成为青年人的创新创业热土。新乡土叙事作品中越来越多的新村外乡人形象正在逐渐消解与重构他者镜像,传统叙事中“乡土—城市”“本土—外来”的二元边界日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共生的新样态。遗憾的是,当下对这种山乡新变、新外乡人的观察和书写还较为有限。

四、新村返乡人：创业与守望

新时代以来，西南乡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国家和各级政府陆续出台大批优惠政策，不断吸引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与世代务农的传统村里人不同，他们见识过都市繁华、徜徉过书山学海、参与过复杂的现代化生产，有知识、有眼界、有信心、有勇气，也更有办法。与新村外乡人相较，他们更熟悉自己的山村，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愿意为自己的家乡贡献力量，是乡村振兴的新力量和新希望。

（一）返乡创业者

新时代新乡土叙事作品中的返乡少数民族青年队伍日益壮大。有的因创业返乡，通过电商直播激活农产品流通链，或依托非遗技艺开发文创产业，用创新实践为乡村经济注入新动能；有的因传承乡村文化返乡，用现代技术记录乡村幸福时刻，唤醒乡村记忆。鲁迅在界定乡土小说概念时，首先强调“隐现着乡愁”。在新时代背景下，通信与交通的高度便捷深刻改变了游子的情感，“怀乡”不再局限于睹物思情式的想象。视频通话、影像记录等信息技术使乡土的面貌随时可见，乡愁的表达方式由内心积郁转向具体而即时的情感联结。在此背景下，带着乡土情感认同返乡的青年，构成了当代乡愁叙事的重要载体。“乡土”并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下消逝，人内心深处千百年来对土地和民间生活的依恋，使乡土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和再造。

与路遥笔下的孙少平不同，新时代返乡青年在离乡过程中并没有与故乡完全割裂。大都市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先进、发达、文明、美好、令人向往的单一面向，乡村也不再是落后、贫苦、愚昧、萧条、令人逃离的另一端。他们因熟悉都市而逃离，因思念而回归，重新发现乡村之美才是他们返乡的直接动力。返乡青年的“还乡”不是鲁迅《故乡》中压抑、苦闷与失望，他们的“还乡”是大胆尝试，带着新时代的蓬勃朝气。《莫道君行早》中，千年村支书麻青蒿的儿子麻浩博精明强干、能说会道，颇有乃父之风，长期在外地工作。实施“三改”彻底改变了本村的文明面貌，与九鼎公司合建农业产业园改变了村中的经济面貌，为青年返乡创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于是，麻浩博回乡成立了快递公司和全市第一家互联网+服务中心，专门销售非遗手工制品和当地农业产品，并创办青年创客中心。大量外出务工青年陆续返村，进入产业园、产业街与农家乐工作，千年村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返乡情绪、怀旧情绪，试图寻觅精神避难所或精神故乡的情结其实是现代人的普遍情感^[429]。但只有在具备一定现实条件的情况下，亲情、故土的牵绊才能与创业的热情相交织。麻浩博等青年返乡创业就业并不是头脑一热，而是家乡已发生了根本改变，为他们创造了建功立业的基本条件。“返乡”不再代表盲目的乡愁呻吟，而是重估故乡的价值，搭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桥梁，让乡村像城市一样享受人才回流的优待。

（二）乡村守望者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却把目光聚焦在民族传统文化上，努力记录传统文化和山乡巨变的伟大进程。《家园》中的琪加达瓦是个“汉藏混血”，从小在川西高原的藏区桑戈草原长大，15岁后到上海求学，后到国外留学。归国后先在上海电视台工作，继而回成都创业。妻子去世之后，他选择返乡，以视频记录藏区的无人区生态环境，记录藏区乡土大地上代际传承的民族文化。琪加达瓦在藏区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格萨尔》的故事早已烂熟于心，这为他日后的叙事创作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赴上海求学与出国留学

的经历,又使他得以接触多元的世界文化,也让他对藏地文化有了更为自觉的认识。斯郎措阿妈对约定的执着遵守、土登舅舅对生命的尊重,藏族前辈的精神始终是他内心深处的根系。琪加达瓦痛失真爱后到处漂泊,“返乡”似乎成为他的精神寄托,用现代媒体记录藏地的传统历史、精神人物、山乡巨变,也是他走出创伤、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

总体而言,当下西南新乡土叙事作品中的“返乡青年”形象还较为有限。许多返乡青年也并非作品主角,但他们的身影同样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已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投身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建设,在广阔的基层土地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雅安市汉源县坭美彝族乡的返乡大学生罗军飞,组织彝族村民学习汉语,推动产业路修建,改善种植方式,提高村民收入。大理宾川的00后白族男孩张鸿林,回乡成为一名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还通过短视频、网络直播、线上教学等方式,向更多人推介白族服饰与白族文化。还有大量回村导游、教师、摄影师等等,他们都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希望和主体力量。“新乡土叙事”还需要更大的思想能量注入其中,以更为丰富饱满的主体形象助推当代中国乡土叙事的新义与新生^[15]。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中的返乡书写是对百年来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的“离乡模式”和单向的“进城”书写的一种“逆向式”回溯与反哺^[16],返乡青年既是乡土价值的对外传播者,又是城市经验的在乡转化者。在新时代的宏大叙事与深刻变革之中,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蜕变,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所系,承载着千年的农耕文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绝非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聚落,更是情感与精神的原乡,它的“巨变”向青年们诉说着乡村的无限可能。作为乡村的新主体与未来希望的返乡青年,他们回归乡土为新时代乡村注入新的活力。

五、西南民族地区新乡土叙事之新变与传承

新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新乡土叙事自觉赓续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倾力塑造新时代民胞物与的众生相。这些新乡村人物群像正在逐步破除“边缘”“他者”的刻板标签,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新时代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的历史性变革。在经纬交织的乡土文学谱系中,与其他地域文学相互补充、彼此呼应。它们将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民间智慧、山地生活与时代精神相融合,既真实记录了乡村振兴的现实进程,也丰富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

(一) 新旧之变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新时代西南民族地区早已不是几十年前封闭、落后的信息孤岛,作家笔下的人物同山乡一起也发生了巨变:

首先体现在“村里人”主体意识觉醒。新时代之前30年的乡土叙事作品主要书写人物的生命悲剧,多表达对村民“守旧”悲剧的悲悯与反思,城乡二元格局的悲剧似乎永远无法破解。夏天敏《土里的鱼》中,望云村村民陷入迷信漩涡,理想破灭后展示出逆来顺受的麻木心态。反观赵国田、迷拉等“新村旧人”,尽管还不能直接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但他们已经对外部世界有所参与和认知,并由此而陷入困惑与迷茫。更多的“新村新人”则主动融入新时代进程,在广阔的西南民族山乡大展拳脚,创新创业,不再是对都市生活单向模仿与崇拜,作为新村人的自豪感前所未有。

其次,新时代下乡干部的角色和工作作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吕翼《割不断的苦藤》中,主人公辛辛苦来自贫穷的苦寨,当上丙县副县长以后,他想尽办法为苦寨修公路,却最终在官场中扭曲堕落,贪腐

落马。《竹笋出林》中的勒吉支书却是30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老党员,带着村民闯过了脱贫攻坚的重重难关。同时,作品还塑造了一心为民、干事创业的吉地、木惹和刘仁贵等其他党员干部群像,勾勒出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风清气朗的新气象。此外,新时代村民的发展理念和科学意识有了明显提高。戴绍康《在故乡的密林中》中,期望劳动致富的农民杨茅用炸药炸树苑,熬制柏香油进行售卖,最终引发山洪落得人财两空。而《烟雨漫漓江》中的明灯却从农民变成了新时代的护林人,护林队日夜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家乡永不枯竭的金山银山。两代村民的不同故事正是我国社会主义不同建设阶段发展理念转换的缩影。40年前,中国还处于“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起步阶段,新时代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基调。

总体而言,作家以“边地民族”发展的“朵朵浪花”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壮阔波澜,进而建构了“边地中国”脱贫发展的新形象^[7]。新时代新山村人物形象之变映照出作家创作的新趋向,植根土地的现实表达与前瞻性的理想高度相融合。新时代新乡土叙事作品中,主要矛盾冲突已悄然发生转移,阶层、权力冲突逐渐淡化,书写重点从此前的“基层官场”内部向广大村民群体和山乡巨变转移。作家笔下的山村并非梦幻中的“乌托邦”,依然困难重重,矛盾多多,却不再为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困,呈现出凝心聚力的新气象。乡村新人也并非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芬芳的泥土气息和喜怒哀乐正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意。

(二) 西南美学传统

面对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西南作家却紧紧抓住西南民族地区的独特气质,不约而同地坚守传承着某些专属于西南的传统之美。首先是悠远神秘之美。西南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几十个民族、数百个民族支系在这里生活、繁衍。各种民族文化、民俗宗教传统异彩纷呈,无数的神话、史诗、传说、歌谣在这里流传,西南新乡土叙事作品中亦俯拾皆是,自然洋溢出一种悠远神秘之美。其次是民族团结的和乐之美。西南历来就是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各民族在茶马古道、南方丝路、藏彝走廊等山川古道之间迁徙流动,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彼此交流、碰撞、融合,各民族不分彼此、亲如兄弟,民族团结是西南新乡土叙事天然自在的话题。正如达真在《家园》中所引的藏族《萨迦格言》“大海要成为水的宝库,必须汇集所有的江河”,正如《逐梦彝乡:索玛花开的地方》中无处不在的彝汉一家亲。这种和乐融合是专属于西南的新时代之美。当然,这种融合离不开作家的主动学习和自然书写。云南作家范稳在《太阳转身》的新书采访中所言:“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身为作家,如果要书写这个民族,就应该把这个民族的文化当成一门专业、一门功课来学习,你要感知他们的文化,还要学会用他们的眼光去看待世界。”^[8]其三是山民的淳朴之美。与新时期、新世纪的西南民族地区乡村人物书写进行对比,新时代新乡土叙事中作家侧重点的转移,从悲情反思到主体赋能,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絮语讲述大时代的中国故事。站在西南民族地区历史长河之外重新审视,其极为多元而复杂的多民族文化构成,各民族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交流、交融所积淀的民族记忆,大量神话、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学形式的流传,以及长期形成的贴近民间、根植乡土的文学传统,共同奠定了这一地区乡村书写与“民间立场”相互渗透的文学底色。因此,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作家对“村里人”不是一味批判,而是用“平视”的角度理解、包容与尊重,用切身体会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不过多渲染“神秘感”,而是在日常关照中幽默化处理这类人物,增添一些生活氛围。与其他地区人物书写相比,西南民族地区作家更习惯拥抱底层人物,用多民族身份的人物

形象展示中国“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文学画卷。同样吸引人的是西南的绿色山野之美。西南地域广阔，山川地貌丰富多样，生物多样性居于全球前列，七彩云南更是绝无仅有。新时代西南民族地区新乡土叙事中，很多作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保护生态、建设美丽家园的主题上，绿色山野之美跃然纸上。保护动物、人与动物亲密无间的故事数量众多，《太平有象》《花豹》《烟雨漫漓江》等都以人与动物的种种交流作为小说主要叙事线索，人与自然的诗意“灵性”无处不在。

所谓“山乡巨变”，包含着“山”的自然环境，“乡”的情感空间，“巨变”的时间过程，因此，乡土中国的振兴与新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代乡村人用“乡村之心”与乡村万物共同建构所成。新乡土叙事不仅是地方色彩的显现，也不仅是立足现实的深描，更承载着对人与土地、传统与现代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与追问。西南民族地区地势起伏、气候多样、多民族聚居，从百年前的茶马古道到如今的“一带一路”，这片土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文化传统，孕育了人民无穷的创造力，也赋予山乡无限的可能。从新时代西南民族地区新乡土叙事中梳理“村里人”“村外人”“返乡青年”形象，可以看出众多作家深入人民生活、从现实实践中寻找创作资源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吸取已有创作的经验教训，力求在人物塑造上有所突破。这些形象既是对奋斗者个体生命的书写，也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变迁的生动记录。

注释：

- ① 阿Q出自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老通宝”出自茅盾三部长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梁生宝出自柳青《创业史》，“亭面糊”出自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陈奂生出自高晓声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孙少安出自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 ② 阿权（马子华《他的子民们》，1935）是在封建土地关系束缚下积极向命运斗争的少数民族农民英雄形象，沙马木札、磨石拉萨（李乔《欢笑的金沙江》，1956）是彝家兄弟互相解开恩怨、消除封建奴隶制思想与共产党携手共建家园的农民代表形象，晓雷（鬼子《被雨淋湿的河》，2001）是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农民青年与城市权贵剧烈冲突的代表。
- ③ 红日《驻村笔记》2019年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光盘《烟雨漫漓江》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范稳《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当代》文学奖，2022年获年度长篇小说总冠军；潘灵《太平有象》获得第三届“青稞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杨胜应《川北风》获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汉文作品类）；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达真《家园》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参考文献：

- [1] 王尧.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9): 46-60+205.
- [2] 新时代的内涵是什么? [EB/OL]. (2017-11-15)[2025-07-04]. https://www.ccdi.gov.cn/special/zmsjd/zm19da_zm19da/201711/t20171115_111765.html.
- [3] 张宏森.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上的讲话[EB/OL]. (2022-08-01)[2025-07-04].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801/c403993-32491093.html>.
- [4] 王尧.“新乡土叙事”札记[J]. 南方文坛, 2022(5): 43-44.
- [5] 钟媛.“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乡土小说”学术论坛综述[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3(4): 215-219.
- [6] 光盘. 烟雨漫漓江[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 [7]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
- [8] 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J].文学评论,1962(5):12-29.
- [9] 向媛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3(7):162-168.
- [10] 雷鸣.生态批评视野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向度[J].中州学刊,2020(4):139-145.
- [11] 红日.驻村笔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 [12] 达真.家园[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4.
- [13] 王华.大娄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
- [14]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15] 曾攀.新乡土叙事:主体、实践与历史的发展意志[J].小说评论,2023(3):120-129.
- [16] 张丽军.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J].中国文学批评,2022(4):11-20+187.
- [17] 杨建军,崔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行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1):147-155+213.
- [18] 姜斯佳.范稳:在太阳转身的时候记录这一切[EB/OL].(2022-10-17)[2025-06-27].https://mp.weixin.qq.com/s/o8aXJ_tyyht0ZwZq1M9ehA.

Study on Character Images in New Rural Narratives of Southwest Ethnic Areas in the New Era

TIAN Yuling, LI Mengying

Abstract: Since the New Era, driven by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profound and lasting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in the vast Southwest Ethnic Areas. A large number of new rural narratives focus o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southwest, record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se mountainous villages, and shape a group of new villager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in the southwest. By combing through three typical types of character images – "local villagers", "outsiders", and "returnees" – we can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leading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to get rich and start businesses,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uilding beautiful villages while protecting the ecology. Through these stories, 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their footprints in staying in, construct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As participants, creators, and practitioners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s, they not only have the shadow of traditional rural figures but also carry unique marks exclusive to the New Era and Southwest China. Undoubtedly, this is a new attempt in writers' creation and a new achievement in the shift of aesthetic perspectives.

Keywords: new era; new rural narrative; Southwest Ethnic Areas; character images;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周兴涛